

---

# 卢沟桥事变与牟田口廉也

〔日〕安井三吉

---

到目前为止,怎样看待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在日本是研究日中战争的人们之间争论的问题之一。<sup>①</sup>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从日中战争的局部阶段过渡到全面阶段的转折点(或者说是日中全面战争的开端),对卢沟桥事变如何认识关系到对日中战争的评价。

这几年来在日本提倡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人们,在口头上都说应该批判“东京审判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也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但是实际上他们越来越接近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关于日中战争,他们否定有“从军慰安妇”,攻击说南京大屠杀过于夸大,并主张卢沟桥事变是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阴谋而发生的。我想他们的“共产国际和中共阴谋”说,归根到底有日中战争不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而是日本和国际共产主义以及中共之间的战争的观念。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在日本从来就有这种日中战争史观。对于这种“自由主义史观”,我在别的文章里曾加以批判<sup>②</sup>,因此在这里不再谈了。

---

① 日中两国关于卢沟桥事变最新的研究动态,参照拙作《再思卢沟桥事变——围绕在中国的日本军计划说》(《东洋史研究》第55卷第4号,1997年3月)。

② 关于批判《自由主义史观》,参照拙作《卢沟桥事变——问题在于日本军的对应》(家永三郎监修《从教科书中不能消除战争的真相——批判歪曲历史的藤冈信胜氏等》,青木书店1996年版),拙作《怎样认识卢沟桥事变》(《历史地理教育》1997年8月)。

本文拟通过再读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1888—1966)的有关卢沟桥事变的笔记,从新的角度来分析卢沟桥事变的过程。

## 一 关键人物牟田口廉也

我认为研究卢沟桥事变有各种方法。首先确定关键人物,再追踪他在事变中起过的作用是可靠的方法之一。从这种角度来看,分析从7月7日夜到7月8日早晨的所谓狭义的卢沟桥事变的过程,我们先确定在三个阶段的各个关键人物,然后分析他们的言行,也是有效的方法。下面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分析事变的。

第一阶段:从7月7日夜10点40分发生了所谓“第一枪”和“一士兵(志村菊次郎二等兵)失踪”的问题,到11点57、58分左右传令士兵到丰台报告给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这个阶段的关键人物是第三大队第八中队长清水节郎。

第二阶段:从一木大队长接到报告到他给北平的第一联队长牟田口打电话。这个阶段的关键人物是一木大队长。

第三阶段:从牟田联队长接受一木大队长的报告到7月8日早晨爆发战斗。这个阶段的关键人物是牟田口和一木。

在事变转变为日中交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阶段。其理由可举下列两点。

1. 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日军的活动是以“一士兵失踪问题”为中心的。日军重视“第一枪问题”就是因为它认为因“第一枪”才发生了“一士兵失踪”。但是“一士兵失踪”问题,仅过20分就完全解决了。清水中队长派传令兵到丰台驻屯队报告了这件事情。<sup>①</sup>如果

<sup>①</sup> 清水节郎氏的笔记,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版,第165页。

清水所记是真实的话,最迟7月8日凌晨零点30分左右,一木大队长已能判断问题完全解决了。即使他没收到传令兵的报告,据他在《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7月)座谈会上的发言,8日凌晨1点左右他也在卢沟桥采沙场见到清水中队长时听到“已经发现了失踪的士兵”的报告了。<sup>①</sup>因此当时他们不会不处理解决这个问题。不管《东京朝日新闻》的发言是否正确(或者仅仅是排印错误),据《第三大队战斗详报》,一木至少在8日凌晨2点3分在西五里店见到清水,从而确认“一士兵失踪”问题早就解决了。但是牟田口和一木不把部队撤退到丰台,反而以“非法开枪”为借口重新提出数项要求,命令部队展开到离中国军队驻地更接近的地方。

2. 7月8日上午4点20分牟田口接受一木的建议,下了向中国军“可以坚决开始战斗”的命令(《第一联队战斗详报》,以下略为《联队详报》)。

在以上两点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是牟田口和一木。一木是在卢沟桥的现场指挥部队和收集情报,并向牟田口报告和提出应该如何应对的建议的。牟田口派宪兵侦察在北平一带的第二十九军首脑宅邸等,听到他们和一木在卢沟桥的现场的报告以及建议,再下了开战命令。一木的情报和建议很重要,对牟田口下命令起过很大的影响,但是最终下开战命令的则是牟田口本人。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从“第一枪”和“一士兵失踪”转变为开战的扩大过程中,牟田口这个人物应该承担最重要的责任。在这个阶段,他实际上是作为第一联队长和北平警备司令官代理指挥警备北平一带地区部队的最高司令官,因而比一木能更全面地掌握情况。因此我认为,对于卢沟桥事变爆发阶段的研究,就牟田口这个人物的言行去分析,是在从比较广泛的角度来考察事变过程的最好的方法。

<sup>①</sup> 《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回顾座谈会》3,《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30日。

## 二 笔记《中国事变爆发时之真相及其前后情况》

牟田口谈及卢沟桥事变的资料不少,其中有战斗详报、笔记、征询和对谈等。<sup>①</sup>这里着重分析牟田口的笔记《中国事变爆发时之真相及其前后情况》(1941年4月10日,以下略为《笔记》)。1941年4月,牟田口已升职为中将,任第十八师团长。这部《笔记》是收录在最高统帅部编《华北作战史要》中的,大概是由于“在原则上只有陆军学校教官可以阅读”<sup>②</sup>,因此它同牟田口在一般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言论不同,而是一种为了陆军内部的特定人物的参考写

① 牟田口的命令、笔记主要有如下:

一,战斗详报:1、《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1937年秋。2、《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1937年秋。

二,笔记:1、《谈卢沟桥事件的真相》,《陆》1938年7月。2、《中国事变爆发时之真相及其前后情况》,1941年4月10日,最高统帅部《关于卢沟桥事件开端的真相》,时期不详。3、《日支事变爆发的真相——谜掩盖的卢沟桥事件》,《丸》临时增刊,1956年12月。4、《关于1944年“乙”号作战的说明资料》(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1964年4月23日,这份小册子也刊登在《昭和史的天皇》9(读卖新闻社,1969年)。

三,采访:1、《牟田口廉也政治谈话录音速记录》(第一次),1963年4月23日,采访者:山本有三,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1993年5月公开。2、《牟田口廉也政治谈话录音速记录》(第二次),1965年2月18日,采访者:国立国会图书馆政治史料调查事物局,1995年12月20日公开。

四,座谈会、对谈:1、《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1—10,《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28日—7月8日(书面参加)。2、《卢沟桥的枪声》,东京第12广播频道报道部《证言—我的昭和史》2,学艺书林,1969年7月,今井武夫也参加。

五,其他:1、《牟田口部队战斗经过的概要》,牟田口部队本部,1937年秋。

② 闲院宫春仁王《自序》,陆军大学《在中国事变初期的华北作战史要》第2卷(1941年7月10日调整)。

下的机密文件。所以,我们通过这部《笔记》有可能知道牟田口对卢沟桥事变的坦率的见解。

包括牟田口在内的有关卢沟桥事变的人物对事变的认识,几乎都是根据《联队详报》、《第三大队战斗详报》和《北平陆军机关业务日志》而成立的。我推测他们的回忆基本上是参照这些共同资料而发表的。牟田口主要根据《联队详报》发表有关卢沟桥事变的回忆。我们也可以推测他本人就是编写它的负责人。这部《笔记》是他在卢沟桥事变爆发4年后写的。因此他一方面参照《联队详报》,同时在文中也表露出他当时直率的回忆以及在《联队详报》里没写的事实,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很珍贵的资料。<sup>①</sup>

### 三 两种“奇袭计划”

根据牟田口的《笔记》,我们可以得知第一联队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策划了两种“奇袭计划”,不但在图纸上而且领导人亲自调查现场,进行过训练。这个训练,《联队详报》也写过。根据士兵人数比不上第二十九军,为了准备“万一之变”日军进行了以夜战为主的训练,“联队全体士兵很努力地进行了薄暮黎明以及夜间的训练。从而每一个士兵对驻屯地附近的地形也背记,熟于夜间训练了”。关于这个“奇袭计划”,在《笔记》上有一些《联队详报》没记载的重要的记述。这里要指出3点。

第一,在《联队详报》上“奇袭计划”只有一个对象(“中国军首脑者宅邸、兵营、城门等”),但是《笔记》上有“为驻在北京的第一大

<sup>①</sup> 牟田口的笔记另外有以《关于卢沟桥事变开端的真相》为题目的。坂本夏男氏在《卢沟桥事件爆发时的牟田口廉也联队长的开始战斗的决心》等文章中利用了这部笔记,但是我只能看到该笔记的一部分。

队策划奇袭中国军首脑者私邸、兵营和城门等的计划和为丰台部队策划奇袭南苑及宛平县城(卢沟桥城)的计划”这样的记述。由于这个记述,我们可以判断当时第一联队的奇袭计划分为两种,一个是由驻北平部队担任,另一个是由丰台部队担任。

第二,关于演习和训练的实况,《联队详报》只写“让各个干部亲自到现场调查几次以及进行过几次演习”,但是《笔记》写着“让各个干部亲自到现场几次,还用模型进行训练以及进行图上演习”;叙述更具体、更详细。

第三,关于演习和训练的成果,《联队详报》没谈到,但是《笔记》则很高地估计说:“照事变爆发后的战斗经过,我深感这些训练给我们带来了伟大的效果。”

有一个可作为这两种“奇袭计划”的旁证。这就是7月8日凌晨3时军主任参谋起草的《宣传计划》。<sup>①</sup>参照发现这个文件的永井和氏的解说,把《笔记》同《宣传计划》对照一下可以发现,《宣传计划》里也有“要人的监禁”和“卢沟桥的占领”的项目,这两个项目是同《笔记》中的两种“奇袭计划”完全相对应的。

其中,关于“要人的监禁”,《宣传计划》写着:“要即时把秦德纯和冯治安绑架到北平警备队内,不许他们自由发表言论和行动”;关于宋哲元,作为命令济南特务机关长的措施写着“在特务机关长陪同下使他乘火车返回天津就任”等5项方案。

而关于“卢沟桥的占领”,则这样写着:“1. 尽快派驻在天津的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炮兵队的大部分、工兵大约一个中队到丰台,在步兵旅团长指挥下,最迟7月9日正午以前占领宛平县城

<sup>①</sup> 关于《宣传计划》的起草者,永井和氏(发现这份资料的人)把他推定为中国驻屯军参谋专田盛寿少佐,可是秦郁彦氏推定为和知鹰二参谋,见《卢沟桥事件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第200页。

……2. 通过协议要它(关东军)派部分飞机队(以指挥联络用,必要时以轰炸为目的)。”

如何实行这个计划,《宣传计划》的起草者附带说明如下:“关于在战时的宣传,当然在平时策划计划,在刚刚开战时首先不过实行原计划。本计划单单是属于这个范围内的,以后随着情势的推移应逐步着手实行计划。”就是说,“要人的监禁”和“卢沟桥的占领”都不过是实行在“平时”已策划的计划,即“属于这个范围内”的计划。但是关于这个计划,起草者却这样写着:“可是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构想,对这个计划是否合乎当时的实况我有点疑问。因此我毫不想谴责当时军指挥员没实行这个计划。”这句话证明两个计划最终没发动,它们不过是起草者的“个人的构想”。

关于第三大队等丰台驻屯队的演习,在日本长期流传的是“以惯熟于用少数兵力的对苏战为目的”<sup>①</sup>的看法。可是根据以上的资料和分析,我们可以确认这个演习是以夺取卢沟桥城为目的的。

#### 四 “一士兵失踪”问题

当时牟田口重视哪一个问题,是“第一枪”(所谓“非法开枪”)还是“一士兵失踪”?这关系到牟田口下决心发出向中国军开战命令的原因,是日本学界关于卢沟桥事变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江口圭一氏<sup>②</sup>和我认为,因为最初听到“一士兵失踪”牟田口才同意丰台驻屯队出动,并让特务机关向中国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如果“一士兵失踪”问题解决之后,牟田口等就把日军撤退到丰台的话,那么当夜的危机完全可以排除。可事实是尽管“一士兵失踪”问题

①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版,第164页。

② 江口圭一:《卢沟桥事件》,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24—25页。

解决了,他们仍以“非法开枪”为借口继续展开部队和要求交涉。可是坂本夏男和秦郁彦氏等<sup>①</sup>却认为,牟田口等从当初就更重视“非法开枪”,而不是“一士兵失踪”问题解决了,牟田口才把“非法开枪”当作借口,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态度。那么《笔记》怎样写的呢?关于7月8日凌晨零点左右的一木的报告和牟田口的指示,它这样写道:

‘因为我接到第八中队长的报告说中队在夜间演习中先受到了从龙王庙附近射的几发(子弹),然后又受到了大概从卢沟桥城墙方面射的十几发(子弹),就停止演习点名,发现缺了一个新兵,正在搜索他,所以出动大队到现场办必要的措施。联队长同意大队长的决心和措施,给他如下的提醒:‘为了应对情况的变化,我注意他们说,应该准备战斗,先把部队集中在一文字山附近,然后叫在卢沟桥城内的营长进行交涉。而且考虑如果我方没得到确证的时候,中国军照例一定主张他们绝没开枪,所以他们开枪后的弹壳也好,你们若能先得到它为证据,再进行交涉就行了。’大队长回答说:是’。”

‘缺一个新兵’这个话,在这部长篇《笔记》中除此以外再没出现过。单单从这个记述来看,我们觉得很难判断牟田口更重视哪一个问题。可是清水中队长就是因为发生了“一士兵失踪”问题,才派传令兵到丰台,一木大队长也只因那样的事件,才出动丰台驻屯队到卢沟桥,不顾深夜报告给牟田口,并听他的指示。下面是三个人的有关证言。

---

① 坂本夏男:《对江口圭一著 卢沟桥事件 的意见》,《艺林》第217号,1994年5月,第70页;秦郁彦:《卢沟桥事件的研究》,第188页。江口氏对坂本的批判的反驳,参照《卢沟桥事件小论——围绕坂本氏的意见》,《日本史研究》第397号,1995年5月。



清水中队长：“知道了缺少一个兵，我就下了决心断然膺惩，一方面准备应战，就快派传令兵到在丰台的大队长处报告。”（《联队详报》）<sup>①</sup>

一木大队长：“只是开枪还没提醒我，可是听到缺少一个兵，我才觉得发生了重大事件，决定了作警备呼集的措施。”（《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30日）

寺平忠辅北平陆军特务机关补佐官：“至少以一木大队长为首的上层人物首先比中国兵的开枪更担心一士兵失踪……就是说也许说他被中国兵的子弹打死了，这个判断使部队急速地作准备应战态势。”<sup>②</sup>

根据一木的报告，牟田口同意一木的措施，我们可以推测，在寺平所说的“至少一木大队长为首的上层人物”中，当然也包括牟田口在内。我们认为，像寺平所说的那样，“担心一士兵失踪……就是说也许被中国兵的子弹打死了”的说法才最接近于事实。因此我认为，有“一士兵失踪”问题发生，一木才给牟田口打电话报告，而不认为接这个报告的牟田口轻视“一士兵失踪”而重视“非法开枪”。虽然事情经过如此，《联队详报》、牟田口《谈卢沟桥事变的真相》（《大陆》）以及《笔记》都没谈到“一士兵失踪”问题解决的事情，

① 战后，关于这一点清水这样写道：“我从今夜的演习可以判断那失踪士兵离这儿走得不远。敌人射的枪弹在头上方飞得很高，所以也可以判断他没有受害。万一他被捕了，他一定会按照演习以前的注意事项采取必要措施。因此我觉得一会儿事情就将解决。可是为了防备发生万一事态，赶快办了必要措施而等待着。因为要赶快报告非法开枪，没等寻找结果的报告，就把这件事一起报告了（这个士兵过20分就发现了）。”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66页。这段记述明显地同《联队详报》的记述不同。关于这一点，可参照江口的《卢沟桥事件》第25页。

② 寺平忠辅：《日本走向破灭的序曲》2，《日本周报》第565号，1963年9月15日，第80—81页。

即志村二等兵回队的事实,这让人感到很奇怪。那么,虽然从事变爆发以来已经有4年了,但是为什么牟田口还一直回避谈到当时“一士兵失踪”问题的解决呢?对于这件事一木讲得非常爽直,他说:“我在西五里店那儿见到了清水中队长。如果当时我们把部队撤退到丰台的话,可能当时事变就不会发生了。可是联队长命令我就应该坚决进行交涉,况且虽然要撤退,他们一定会说一开枪,日军就停止演习和撤退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日军的威信就会严重降低,而且将来几乎得停止演习。因此不管怎样,我们决定了坚决要求交涉。”<sup>①</sup>

## 五 “局部的突发事件”

7月8日凌晨4点20分牟田口作出开始攻击命令时,他的判断有下面3点理由:

1. 凌晨3点25分的所谓“开枪”事件。
2. 1936年9月18日的丰台事件的教训。
3. “局部的突发事件”。

这里就第三点根据《笔记》分析一下。一听到一木的事件报告,8日凌晨零点半牟田口就命令北平宪兵队赤藤少佐侦察中国方面,特别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和第二十九军的要人宅邸以及西苑、南苑和黄寺等地中国军的情况。两点半左右有了报告。下面是报告的内容和牟田口对它的判断:

“确认中国军和要人邸宅无声息很清寂、没什么特别情况以后,向联队报告了。这个报告对警备司令官代理联队长下决心是个

① 偕行社编纂部:《卢沟桥事件的回顾——中国事变四周年纪念座谈会记事》,《偕行社记事》1941年7月,第49页。

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因为他判断了这次事件不是中国方面的有计划的行为?而完全是卢沟桥附近的局部的突发事件。”

在发出向中国军开始攻击的命令的时候,牟田口再一次考虑到这一点,以判断“这次事件不是中国方面的有计划性的行为而是局部的事件”为其重要的根据。关于这一点日本政府的正式见解却是在以中国方面有计划地为框架而被固定化、普遍化了。可是在事变4年后牟田口回顾当时的情况时却自问自答道:

“今天推测这件事果真是中国方面的有计划性的行为?我仍认为不是。因为像事件的经过所证明的,这当初限于卢沟桥局部一带,中国方面没有全面的行动以及发现中国要人的惊慌失措等,所以我那样判断的。”

这就是说,“第一枪”是“局部的突发事件”。

## 六 “老天保佑的事件”

1941年4月牟田口回顾卢沟桥事变,一方面对中国的抗战力量的增强吃惊,另一方面认为因为卢沟桥事变是在中国还没充分准备的1937年7月爆发,对日本来说事变是“老天保佑”的。他说:“本事变是在敌人还没完成充分的战斗准备前突然爆发的。”“其结果是事变在不但第二十九军而且南京政府还没完成抗日战斗准备的时候终于提前爆发。以后我认识到南京方面规模怎样大,怎样周到,想到它会带来什么结果。因此我对事变早点爆发,心想是老天保佑,是应该感谢的。”

当然,牟田口听到在日本对卢沟桥事变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从卢沟桥事变算起,到1941年日中战争已经有4年了。1938年牟田口升职为少将,从华北方面军调任关东军,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回到过华北的战场。卢沟桥事变对他来说一定是印象深刻的。大概连

他也想不到中国的抗战那么坚强那么有坚持性。回顾卢沟桥事变,他说“对皇国来说是老天保佑的事件”的时候,心里一定有一种要为当时他的指挥辩护的心情,对估计中国的抗战力过低的自戒之观念。众所周知,1943年3月牟田口就任第十五军司令官指挥英帕尔作战而与英军部队打了大败仗,使无数士兵战死。日本投降后不久,1949年高木俊朗写了一部报告文学《英帕尔》,在这本书中他以“与田内将军”的角色让牟田口登场,并让他这样讲:

“‘大东亚战争就是我的责任。就是因为我在卢沟桥开第一枪和爆发战争的是我,因此我想应该从自己手中结束这次战争。好,你们看着吧!他好像稳操胜算,胸有成竹。’”

作家高木最后加以如下评语:

“英帕尔的战斗,结果是日军的凄凉惨淡的大败战。东条、与田内策划的征服印度的野望轻而易举地崩溃了。在卢沟桥开第一枪的与田内将军总是说他本身有责任结束太平洋战争。他确实实现了他这句话,但不是作为胜利者而是作为败北身份。”<sup>①</sup>

与田内将军即牟田口廉也第一联队长的卢沟桥事变就这样使日本闭上了战争的帷幕。战后牟田口通过笔记和征询等方法谈论过卢沟桥事变。1965年7月8日东京第12广播频道播放采访牟田口和今井武夫(原驻北平大使馆副陆军武官)的谈话《卢沟桥的枪声》。这大概是牟田口公开谈到卢沟桥事变的最后一次场合。采访者问他:“那么,您光听到一木的报告的时候,还弄不清楚。您认为新兵说不定被射中了,就是说因为对方开枪他就失踪了,况且是

① 高木俊朗:《英帕尔》,雄鸡社1949年版,第35页。但是以后作者在《英帕尔》(《世界记录文学全集》16,筑摩书房1961年版,第346、472页)上把与田内将军修改为牟田口中将。作者本人曾以新闻报道班员的资格参加英帕尔作战,他谴责牟田口在作战中的错误指挥。

夜里……’对这个询问，牟田口回答说：“是的。”<sup>①</sup> 这同上面已经介绍过的寺平的回忆是一致的。

## 结 语

通过分析牟田口廉也的《笔记》，我们可以提出下面的看法。

1936年9月，华北驻屯军已制定了《华北占领地统治计划书》。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它还有向第二十九军攻击的两种《偷袭计划》。即是“要人的监禁”和“卢沟桥的占领”。第一联队按照这两种《偷袭计划》事前调查现场，进行过很猛烈的训练。7月8日凌晨3点，有个主任参谋起草过两种《偷袭计划》。以上都是根据日本的档案来确认的。但是从7月7日夜到7月8日凌晨，华北驻屯军的行动不是根据这些计划实行的，而是“局部的突发事件”。日军利用这个“突发事件”来扩大事变，最后导致了全面战争的爆发。1941年4月，牟田口廉也回忆说卢沟桥事变是“老天保佑”日本的。但是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应该说，当时他们的行动是使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灭亡的重要的一步。

（作者安井三吉，1941年生，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

---

① 《卢沟桥的枪声》，第183页。战后，牟田口主张卢沟桥事变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谋略而爆发的。